

新民时论

小区有栋楼即将装电梯了！这个喜讯传遍了各家各户。虽然还刚进入电梯公司前来勘察、尚未动工的阶段，但已经为小区居民所热议。上海已进入了老龄社会，老年人占户籍总人口比例已经突破百分之三十的关口。多层住宅的老人没有电梯，出行不便，加装电梯，改善生活质量，是他们的迫切要求。尽管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，支持这一惠民实事工程，不少企业也有积极性承担相关工程，但在上海加装电梯成功的案例不多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症结在何处？有关

技术专家说，加装电梯无技术难题。在政府方面，已经出台文件对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给予补贴。依笔者之见，在技术和资金不是主要问题的情况下，当前加装电梯的难题主要是伦理情感问题。住在顶层的居民，加装电梯的愿望最迫切，而住在底层的居民考虑到加装电梯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往往不赞成。相关法律可以规定一个大的框架，但要使楼层居民在加装电梯问题上达到法律规定的户数要求，并不容易。尽管不赞成加装电梯的居民是少数，但少数人

破解加装电梯的伦理难题

周中之

的权利和意愿在法律的框架下仍必须得到尊重。这就涉及城市发展和建设中不可避免的问题：在不同利益诉求的情况下，如何通过有效的途径，达成破解难题的共识？可以寄希望于政府有关方面出台更有利的政策，也可以憧憬技术的改进减少电梯在采光、噪声方面的负面影响，但其中有一项基础性工作不能视而不见，就是建设友善的邻里文化，让伦理的情感注入加装电梯的过程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本世纪以来，上海居民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，

居住在独立成套住宅中的家庭已是主流，但邻里间的交流却不容乐观。楼上楼下往往形同路人。记得国外一篇材料中记载了一个幽默的故事，有名旅游爱好者在邮轮上结识了一个“新”朋友，但交换地址后，他发现两人竟是楼上楼下的邻居！故事也许有夸张的成分，但却揭示了现代人际关系中的尴尬与无奈。在现代都市生活中，应该鼓励和倡导邻里之间的多交流、多互动，把友善、温暖的邻里关系作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。这样，遇到加

装电梯之类的事就有了协商的基础。中国古代的孟子倡导建设“亲睦”的邻里关系，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”。人民在生活中也常说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我们应该弘扬中华传统美德，树立一代新风。住在楼上的“阿婆”“阿奶”“阿爷”“阿公”年事已高，加装电梯改善生活，楼下的邻居应该更多地给予支持和理解。而加装电梯会给底楼的住户带来不便，也是事实，楼上的住户也应该体谅。大家在友好、温暖的邻里环境中，许多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，邻居之间要换位

思考、合作共赢。现在，“共同体”是比较流行的概念。一个屋檐下的邻居，也许只有十几户人家，也是一个小的共同体。在这个共同体中，各家抱着友善相处、合作共赢的理念处理加装电梯问题，协商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也许加装电梯这件事取得统一意见并不容易，但我们依然可以乐观地看到，技术的发展、政府的支持和友善的邻里文化的建设，必将推进多层小区加装电梯的进程。（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导）

“一桌餐”是啥玩意

凌河



已晚谭

把“年份茅台”倒在矿泉水瓶里，遮人耳目照样喝，把“极品烟”开成“yao”，列在菜单中照样报，吃喝风“离散转移，深入地下”时，“八项规定”颁布四年多之际，反弹之中又出来一个“一桌餐”。

“一桌餐”是啥玩意？据纪委方面近日定义，“是指由私人住宅改造，不对外公开营业，仅为少数特定人员提供餐饮娱乐服务，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隐秘场所。因为一般只提供一桌客人用餐，故称为一桌餐”。“一桌餐”不吃公款吃老板，由私营企业主把私人住宅改建成招待场所，组织者以没有动用公款而无所顾忌，参加的官员以私人聚会而心安理得。“老板”也因为“服务领导”而乐此不疲。这种家庭式会所的“一桌餐”，这种“不进会所进社区”的隐蔽吃喝聚会，仅在南昌市高档的海珀兰庭封闭式富人区中，纪委就发现17个“一桌餐”场所，引起了中央巡视组的警觉和“交办”。

“八项规定”四年多了，吃喝问题不是好多了吗？是的，好多了，收敛多了，这是一句话；但是仍在“转入地下”，伺机反弹，甚至还有“顶风作案”的，这也是一句话。或曰“躲起来吃”，乡间会所、机关食堂、老板私邸，都成了“转战”的“南北”，先是关起门拉起窗帘还要吃，后来豪华客馆不能去了，把“内部食堂”装潢一新，在“里面”吃。在一段时期中，为什么市面上高级厨师忽然抢手？因为“食堂”里老阿姨手艺不够档次，要换成高帽子的“大厨”来掌勺啦！或是“到下面吃”，八项规定三年时，不是还有一个什么“分局”，一个月招待酒肉达48次吗？也不要只怪他“顶风吃喝”，实在是“下来检查、评比、督办的太

多”，所以都要“招待”啊，连他的办公室主任都“说不清来的是谁”，只知道“领导”来了！还有一种“酒桌办事”，这是某省纪委半年前抓出的一个“新动向”。借“办事”而吃喝，举“公务”而招待陪吃，成了一个新变种，近日之际，不是还有某地官员，主动“下去”，“考察旅游线路”，一路吃喝沿线“旅游”，成为笑不出来的笑柄吗？

“八项规定”四年多来，关于这个吃喝问题，有些官员一直没有“太平”过。起初是“忧国忧民”，惊呼“内需拉不动”啦，危言“经济要不行”啦，似乎没有了公款消费，发展繁荣就要成泡影；接着是“屏不牢了”，过了几年“苦日子”，皮带都得打洞了，再也“坚持不住”啦，不光埋怨“官不聊生”，而且怒问“做官有什么意思”，他是要顽强地“反弹回潮”啦。当然还有人预言，“风头”终会过去，“阳光总在风雨后”，不是早有人在谈论什么“四年之痒”吗——可见例如“一桌餐”那样的“新动向”，并非孤例个案呵！

也有人说，有些官员“饒”，这些“农民的儿子”，这类从小没有吃饱过肚皮的“于连”，当官以后忽然“吃惯了”，逐渐形成了胡吃海喝的“生活方式”，你要他“不吃”，还真要他的命呢！但依我所见，吃喝风这样一种某些官场政治生态的标配，并不只是“解饒”，也只是满足胃的渴求，像以吃喝为纽带的“西山会”“汾酒会”等等，实质是拉帮结派的朋党、“小山头”里的“小圈子”，他吃的是“政治饭”，喝的是“结对酒”呢——说这是一种“政治文化”，一点也没有错。你看那个“一桌餐”，因为“风险”甚大，所以抱团更加隐蔽，“兄弟”更为贴心，“圈子”更显紧密，又因为只是区区“一桌”，所以来的均为“常委”，可不要小看哦！

同济的范儿

姜泓冰



拾字街头

上海有30多所高校，其中，有好几所享有盛名。如果要我选一所最喜欢的，答案……是同济。我喜欢同济的范儿。

高校的校风文化是一种似有若无的微妙东西，尤其是在大学扩招、办学规模都趋向于巨无霸、专业都是大而全而杂、评价机制同质化的背景下，许多高校传统的主色调淡去，新的还来不及养成，失去了鲜明个性和气质追求，只有办学水平高下、优势专业领域不一的差异，从办学理念、管理模式、课程设置到师生面貌、校园环境都逐渐趋同，有着一群同卵多胞胎兄弟姐妹一般的相似面貌，非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的亲人故旧，很难区分出这个和那个大学，到底有何不同。

喜欢同济有很多理由。比如春天里同济有漂亮的樱花大道；比如上海高校中流传多年的“吃在同济”；比如校园里不同年代的新老建筑全都朴素无华地和谐相处，不见外表的豪华奢侈，却动足了环保循环，以人为本的脑筋；比如碰上汶川地震之类重灾危难时，最急需的权威专家和优势学科，同济都有并且当仁不让；比如别的大学都是自上而下争设“大学科技园”，它却自发生长出一个产值惊人的“环同济知识经济圈”，且80%的企业都由同济师生建立……

穿过这些纷繁表象，到底什么是同济的“范儿”呢？那首先，该是源自它的前身、德文医工学堂的“基因血统”。一出生落地，就继承的是严谨认真到有些死板苛刻的德国人的文化性格，严谨方正、重视规范 and 一丝不苟的技术细节，看不起口若悬河有名无实的空谈者，容不下疏忽大意没有实证的轻举妄为。最近正在

举办的同济校史文物展，展品里有一代代同济大学学生的课堂笔记、论文手稿和制图作业、设计图纸，其工整、清晰、准确都足以让人惊叹感佩。即使是流亡到四川的小村庄简陋办学，培养学生时依然要求严苛，比如要求一年级学生必须进车间实习劳动；工科生制图必须上墨、习题计算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、学生都能使用计算尺和应用工程手册；补考后仍有一门不及格者留级一年，等等。

同济范儿，也是低调、踏实，不怕做小事、杂事，因为多半具有很强的工程思维，懂得平衡轻重、统筹兼顾，重视团队协作，行事、待人，对于团队、社会和国家民族，都有一份发自内心的郑重与责任感，也时时处处有规范准绳或是底线，而没有自我认为“精英”的傲慢或是夫子式的迂腐，不肯为些名小利急急追逐、包装，成事之前宁愿只做不说，多做少说，遇到媒体报道，总怕有片面夸大而不实之失。

敢于低调，前提是要在一行一业之中有不容忽视的实力和地位才行。当年日寇侵犯上海，不顾国际公约而悍然轰炸的两大文化设施，一是商务印书馆，另一便是同济大学。前者意在截断民族精神文化财产，后者则为了遏制“中国制造”尤其是军工产业的高精尖人才培养与发展……如今没有了别人的恶意轰炸、干扰，我们的大学能不能做到不自乱阵脚，空散了自己的精气神？

今天正逢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。说道“同济范儿”，算是给百年老校的小小道贺，想的却是给更多大学的提醒：大学当有自己的态度，修炼好顶尖内功，找准自己的气质并持之以恒地坚守、打磨，不惟上不惟利不惟名只惟实，才是根本。

“衣锦还乡”之外

钱文忠



月半杂谈

“衣锦还乡”是个常见的典故。《史记》记载，楚霸王项羽攻占秦朝的都城咸阳后，有人劝他定都关中，但项羽思乡情重，说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，谁知之者”。这本是楚霸王痛失帝业的一大关节，大家都熟悉。后来，“衣锦还乡”就成了一个成语：离乡游子功成名就之后，都要荣归故里，光宗耀祖，帮扶乡亲，建设家乡。比如，吴越王钱镠就曾这样做过，而且，不仅自己“衣锦”，还将家乡临安的树都披上锦绣。于是，吴越钱氏就有了一个堂号“锦树堂”。今天已是蔚为巨族，枝繁叶茂了。

让我想起这个典故的，并非思古之幽情，而是现实之关切。近来，我有几位来自农村的好朋友终于符合了所在城市的落户条件。对于朋友们和这座城市来说，这当然是“两全其美”的事情。但是，假如将朋友们的故乡也纳入考虑范围呢？大概，我们并不能得出“三全其美”的结论。

实际上，我们在谈一个城乡关系的问题，一个牵涉到国家整体均衡发展的大问题。从传统来看，中国城乡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，人口和财富双向流动。特别是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以后，乡村倾一家、一族之力，通过一代或几代人的奋斗，总有几颗读书种子，能够穿过科举的折算，成长为参天大树。乡村学子获得足够的功名后，跻身精英，离乡出任，经过历练，眼界胸襟自然开阔。到了晚年，除了很少的例外，这些游子都会叶落归根，衣锦还乡，退为乡绅，建祠设学，标举家风，致力于培养下一批读书种子。读书显贵者如此，经商富贵者也如此。由此，外面的世界进入了乡村，两者交相互动，发展共荣。我们今天在很偏僻

的乡村，往往还可以看到高门大宅，宗祠乡塾，通常都挂着文物保护单位和各级文化遗产的牌子，都是上述历史事实的残留与写照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些还是劫余之后，过去更是相当普遍的。

城市化与中国的近代化、现代化相伴相行，但是，更多的是乡村为城市作出牺牲。到了今天，中国的城乡差距不容否认。我们怎么能够指望来自乡村的精英人才，以及他们的子孙，再回到医疗卫生、工作学习、生活保障等条件都远为落后的乡村去呢？于是，今天的“衣锦还乡”无非只是第一代城市人还很看重的春节项目罢了，和传统的意义已经迥然不同。这难道不是一种苦涩和无奈吗？

我的这几位朋友很有孝心，都已经或正计划将自己的父母接到城市奉养，也好一遂祖孙三代相互照应，其乐融融的心愿。这当然是大好事。然而，这也揭示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：能够培养出乡村学子的家庭家族，通常都具有有梦想、重知识、讲读书的良好传统和家风。而今，离开乡土的不再仅是个体的学子，而是家族的一支或一房。如果说，朋友们的进入城市，可以比作乡村优秀树苗的移植；那么，一支一房的离乡入城，就是从乡村彻底铲起了营养特别丰富的一块沃土。

如何改变这种令人担忧的现象？这是一个牵涉面极广极深的大难题，这里不能详论。我只想提出一个思路。最简单地讲，人与故乡的关联基于乡情，而乡情必须植根于乡土。今天，能否再给城市引进的优秀人才提供一些特殊条件呢？比如，保留原乡户口，来自农村的，由此可以保留一块小小的宅基地？

我只是希望，“衣锦还乡”还能够活生生地存在于当下，而不是埋没在故纸堆里。这是一个事关中国整体和谐发展的大问题。